

智利的經濟危機與亞蘭德政府的動向

王建勳

壹 左傾的經濟措施

一九七〇年九月，社會黨領袖、馬克斯主義信徒亞蘭德（Salvador Allende）當選為智利總統，他一開始即聲言他的政府將在樹立一個「社會主義」目標上，以合法程序進行改革。所以在亞蘭德執政以後，他雖然有意要繼承前傳瑞（Eduardo Frei）總統尚未完成的「自由革命」（註一），但是亦不能隱藏要以激進的方法達成「社會主義」革命的意圖。

亞蘭德的矛盾，主要是來自於智利歷史的影響；人民維護民主政治的傳統，不但智利人民不允許「共產主義」政權出現，對於激進的改革亦多不表贊同。尤其是右派的國民黨與基督教民主黨所代表的一些「中產階級」，更是莫大的阻力。如果亞蘭德要在前傳瑞總統的「自由革命」以後，再發動一項激進的「社會主義」革命，亦確是一個冒險的行動。

亞蘭德首先遭遇的困難就是國會。因為亞蘭德的左派「人民統一陣線」在國會中只有三分之一的席位，他無法獲得由國民黨及基督教民主黨控制的國會支持。亞蘭德既要依循合法的程序，又要逃避國會的牽制，就唯有另外尋找可行的辦法。於是在一九七〇年十二月一日，亞蘭德政府的經濟部長佛斯哥維克（Pedro Vuskovic）就起用了一些早已被人們遺忘的法令，作為走向「社會主義」的依據。其主要者有：

一、依據一九三二年所制定的五二〇號法令，對紡織廠實行徵收。按該項法令規定，政府可對所有壟斷企業進行徵收，特別是紡織工業。

二、重建一九三九年左傾政府所創立的「合作社」（Corporaciones de Fomento），使其在國家管理之下進行經濟結構的改革。按該「合作社」在國家干預之下，其權力非常廣泛：它可以假藉人民的請求，而對某一特定企業由國家管理。諸如硝酸、水泥、銅產、電力等企業，即為亞蘭德政府要依此轉移為國營的目標。此外，它亦可以對造紙工業，如紙張、紙板的供應

實行限制。惟此一措施已遭到企業者們的強力反對，所以「合作社」的活動仍僅以談判與說服的方法來轉移那些企業的態度。

三、使用「勞工法」中的部份規定，實行對大企業以及大地主的干預。按「勞工法」規定：凡勞、資衝突而致該企業發生癱瘓者，經過勞工的請求，政府即可對該企業實行接管。所以一些規模較大的魚產加工業、美國「國際電話及電報公司」（International telegraph and telephone）以及阻撓著土地改革的大地主們的土產，均可通過此一安排而達成徵收或收歸國營的目的。

在此一企圖上，亞蘭德不但遭到各方的反對，亦遭到國民黨及基督教民主黨的譴責。智利國會更主張修改憲法，限制總統所有徵收私有財產的權力，壓制亞蘭德政府必須要保持私人與混合企業的經濟結構。亞蘭德政府雖然在這方面解說，表示政府運用這些過時的法令從事改革，主要是為了造福人羣，而不是對人民壓制。並且指出，在過去的政府對人民所提出的承諾，遠比實際行動為多，而今他要克服這些阻力來進行改革。但是在一年零八個月中，由於不斷加深的經濟與政治危機，亞蘭德政府已遭到嚴重的挫折。

貳 「銅礦國有化」與外債的重壓

智利是世界銅礦蘊藏量最豐富的國家。它的輸出佔世界第二位，產量佔第四位，所以銅產即成為智利主要財富。但是智利的銅大部份是由美國的安那康達（Anacanda）與肯奈考特（Kennecott）兩大公司所開發。雖然智利可從一個稅制及關稅協定上獲得不少稅收，但是智利人民對於國家資源外流的反感愈來愈深，至前傳瑞總統時期，「銅礦國有化」的爭論更為尖銳。傳瑞總統為情勢所迫，曾與美國銅礦公司進行長期的談判，最後雙方協議由智利以七億二千八百萬美元和更多的銅礦開採權，取得美國銅礦公司51%的股權。而今亞蘭德政府尚未在提高銅產方面獲得更多好處，相反的還要繼承

所應償付美國銅礦公司這些債款的重担。所以亞蘭德一開始即面臨着一項選擇，那就是他要從理想中滿足智利人民的驕傲，還是拒絕那些激進的請求，繼續傳瑞總統以合法程序來處理「銅礦國有化」的問題。就如極左派的主張是要扣除美國銅礦公司從一九五五年以來所獲得全部利潤的百分之廿至五十，以作為徹底實行銅礦國有化的補償。他們認為追溯以往所掠奪的利益，而進行「銅礦國有化」是合法的，因為智利仍很貧窮，沒有錢買回這些財富的主權。而其他的無論是政黨、軍人或宗教，對於國家的主要財源，都主張完全收歸國有，迫使亞蘭德必須要表明他對「銅礦國有化」的態度。所以在一九七一年七月十一日，智利國會就順利的通過為達成「銅礦國有化」的憲法修正案。在那天曾引起千萬智利人民的熱烈慶祝，就好像智利從反對西班牙統治一個半世紀以來，又一次在經濟上獲得獨立的莊嚴日子一樣。

「銅礦國有化」不但可引起智利政治劇變，並且在所面臨的諸多現實問題中，尤其是外債問題，必然會在對外關係上造成更大的危機。自從蘇俄與毛共分別給予智利五千萬美元貸款以來，智利與美國的關係已成僵持局面。而亞蘭德政府「銅礦國有化」的企圖，首先就遭到美國迫債的威脅。因為自傳瑞總統任期開始（一九六五年），智利來自於美國及西歐的外債即不斷增加，至亞蘭德執政開始，其外債總額已達卅八億美元之鉅（其中包括購買美國銅礦公司股權的債款在內）。（註二）因此，雖然智利與美國在「銅礦國有化」方面的爭論還很激烈，但亞蘭德却不敢在這個問題上繼續與美國惡化，同時，他亦要避免智利人民在「銅礦國有化」的尖銳爭論中與美國發生衝突。最後依然試圖從談判中獲得解決。

從一九七二年二月三日在巴黎召開的智利與國際債權人會議，會中美國與智利亦曾進行了單獨談判。智利外長阿利美達（Clodomiro Almeyda）在會中曾提出他們的負債表，指出除以色列以外，智利是世界負債最多的國家，現在每一個智利人民即負擔三百美元的外債。智利的處境曾獲得出席會議的十六個國家的同情，其中包括美國在內。因為美國國會以及尼克森總統都堅持要對那些不予公平合法補償的「國有化運動」予以經濟制裁。這亦是因為美國為防止對其他接受美國私人資本的國家發生傳染作用的不得已作法。最後智利與美國對於「銅礦國有化」的談判趨於和緩，在相互諒解中，美國同意智利從一九七五年一月一日開始償付所應補償的欠款，並展期三年償

付卅一億美元的外債。此外智利還獲得美國私人銀行的保證，美國貸款給智利三億美元。

叁 財經危機

由於銅已成爲智利主要的財源，所以銅在國際市場的價格與銅的產量對於智利的國家財政都有直接的影響。但是自亞蘭德政府開始，從一九七〇年底至一九七一年底，國際市場銅價即不斷下跌，其所遭受的損失相等於3%的銅產量。一九七二年一月，國際市場銅價好轉（一九七一年十二月國際銅價為每噸四一〇英鎊，一九七二年一月是四二〇英鎊），這是由於桑比亞與智利銅礦工人罷工所引起，事實上，歐洲對銅購買力不强，價格仍不穩定。所以亞蘭德政府不但對搖搖不定的銅價特別敏感，對於工人罷工所造成的損失亦頗感威脅。一九七一年，就由於礦工的罷工，使銅產量減少了8%。以智利最大的朱基卡瑪達（Chugucanata）銅礦而言，即損失了六千萬美元。

國有化與各項左傾經濟措施雖尚未達到目的，但其所造成的緊張氣氛，已使國內資本大量外流，其所引起的工人失業與工業成長的衰退，更無法配合消費的增加。更不幸的是亞蘭德政府企圖徵收在智利境內的美國「國際電話、電報公司」財產，更加深了國際金融機構的恐懼，而不願再提供新的援助，如美國銀行及世界銀行均中斷了對智利的貸款。因此，智利的外匯更為短絀、國庫空虛、通貨不斷膨脹，國家財政已到了惡化的境地。

一九七〇年智利的通貨膨脹率是20%，還比較溫和。一九七一年，由於工資提高20%，貨幣發行量亦增加118%，通貨膨脹率更急劇的增長。據基督教民主黨所提出的數字，在一九七一年，通貨膨脹率已達35%。一九七二年，只有四個月的期間，就又增加了13%。如此一情勢不獲改善，一九七二年，通貨膨脹率即可達50%以上。

無法制止的通貨膨脹，必然招致人民的反感，起碼主婦的菜籃已不能像以前一樣的滿載而歸了。人民的憤怒，反對黨的譴責，他們已把亞蘭德當作經濟災難的禍首。亞蘭德政府的計劃部長馬特尼（Gonzalo Martner）曾對憤怒的人民解釋說：智利要走向「社會主義」必然要遭到很多困難，這是我們

預料所及並已作妥善的安排。他比較着說：在亞蘭德政府以前，人民沒有能力購買電冰箱、摩托車，以及一些貴重的日用品，雖然這些商品的貯藏是很充足的。因此，他呼籲智利人民在消費方面不要以政治與經濟的觀點來衡量。他說：為增加購買力，我們政府曾提高了20%的工資，為了復興國家經濟，我們政府亦嚴格的控制了國家的財富。他指出：從一九七一年九月，肉類消費已增加15%，蔬菜增加了35%，糖增加25%，這證明物品供應量並沒有減少，只是消費增加的關係。（註三）

無論馬特尼的解釋是否能減輕亞蘭德政府的責任，但對於尚屬落後的智利而言，無論如何人民還是承受着生活痛苦的煎迫。一般而言，智利人民居住的環境、食物的缺乏、穿着的破舊，所有衣食住行都是非常困難的。因此，大多數智利人民所最關心的，仍只是如何能改善他們貧苦的生活。那麼亞蘭德為要在「社會主義」目標上，先迫使人民束緊腰帶來增加生產，在當前智利的環境中是很不容易渡過的難關。在古巴共黨頭子卡斯楚訪問智利以前不久，亞蘭德即曾呼籲智利人民，在從事「社會主義」建設的開始，其所遭遇的困難正如同古巴革命初期一樣。但由此引起智利人民的恐懼，都認為亞蘭德已給智利帶來古巴的災難。

根據接連於共產主義的經濟部長佛斯哥維克的理論，他並不否認前佛瑞總統的一些成就。所以他承認在佛瑞總統時期，六年任期內，曾完成了三萬二千幢國民住宅，解決了十二萬戶的居住問題，另外一萬八千幢國民住宅的興建是因受到地震的影響而停頓。在農業方面，佛瑞總統在人民騷亂與反抗中進行土地改革，曾有二百四十萬頃土地重劃，並在土地肥沃的中央谷地區徵收了三百五十萬頃土地，創立了一千四百個農莊，使一向落後的農業增產了5%。但是佛斯哥維克却認為佛瑞總統未能在自由主義經濟制度下使已達到六百美元的國民所得，在分配上能够更為平均，因而佔全國國民生產30%的壟斷企業就成為佛瑞總統進行「自由革命」的阻力。所以佛斯哥維克就主張在其「社會主義」的建設上，必須採取激進的措施與國會對抗；先達成國營企業的形態，如此才能在一九七六年開始進入「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的階段。然而佛斯哥維克所提出的九十一種企業應收歸國營的名單，不但引起這些企業者們的堅決抵抗，並且亞蘭德政府在財經危機當中，亦沒有這麼多的錢來收購這些私人的企業。所以佛斯哥維克的「社會主義」建設計劃，不僅

智利的經濟危機與亞蘭德政府的動向

是行不通，亦可以說根本無法實現。迄今還沒有一個新的國營企業真正的建立起來。（註四）

可是眼前的問題：通貨膨脹已達到危險的地步，工資與薪金已無法追上生活指數的升高，又如何解決？在一九七一年底，曾有一些企業家向亞蘭德政府質問：有關政府財政所出現二億一千萬美元的赤字，以及國庫準備金每月減少二千二百萬美元的問題。根據計劃部長馬特尼的答覆，表示赤字是政府的財政計劃，而不是通貨膨脹，因為亞蘭德政府的政策不是傳統的。他提出未來的遠景說：我們避免國家資源的浪費，對於美國資本經營的銅礦將有更好的措施，所以銅產量到一九七六年將增加80%。在一九七二年，我們將依靠一個稅制的改革和國際的援助而走向工業化的道路。他說：現在已有社會主義國家三億八千萬美元和國際組織一億美元的援助，在儘可能的將來還可以獲得法國、東、西德、英國和日本的幫助。所以他相信雖然有三十多億美元的外債和每年外資所賺去的三億美元的利潤給智利帶來不少困難，但如果努力克服這些困難，將來智利的經濟並不是一個災難。（註五）

當真的，從智利還不能缺少外資來看，亞蘭德是不會採用「共產主義」的。然而在他們「社會主義」經濟的遠景中，如何扭轉經濟危機和克服諸多的困難？這還是智利在政治上所激烈爭論的問題。

肆 政治鬥爭

亞蘭德政府執政以來，不單是財政與經濟情勢逐漸惡化，在政治上亦引起劇烈的鬥爭。一九七二年一月十六日智利的地方選舉，都是反對黨獲勝，這對亞蘭德政府而言，無疑是一大打擊。並且由於亞蘭德政府的左傾經濟措施所遭受到的阻力，亞蘭德與基督教民主黨更形成敵對。主張武裝鬥爭的極左派，又認為亞蘭德太過軟弱，主張只有用「粗暴」的方法來對付「資產階級」與那些外資，才能避免智利人民立刻束緊腰帶。因而極左派亦要與已陷入改革泥淖中的亞蘭德進行一場賭博。

古巴共黨頭子卡斯楚在一九七一年十一月曾到智利訪問，在他訪問期間，曾很小心的與極左派保持相當距離。但是在卡斯楚離開智利以後，極左派即攻擊亞蘭德政府說：古巴卡斯楚是從「共產主義」起家的，而亞蘭德表面

上是走「社會主義」路線，實際上則仍沒有放棄舊有的傳統。這就是說，極左派對於亞蘭德儘管口頭上說着「社會主義」革命，但在實際行動上所表現的躊躇仍是相當不滿的。

智利的極左派是分為兩大支派。其一是親毛共的「革命共產黨」(P.C.R.)。這支共黨是絕對反對「修正主義」，所以他們認為亞蘭德政府完全走着「修正主義」路線。他們譴責亞蘭德政府的經濟措施，仍是在維護「資產階級」而忽略了羣衆的利益，因而就成為「社會革命」的障礙。並且指出亞蘭德與侵奪國家財富的壟斷集團妥協，更加深了對「工人階級」的剝削。但是這支共黨沒有太多的羣衆，迄今仍只是在秘密中活動。其二是「左派革命運動」(MIR)，這亦是最重要的「極左派組織」。他們認為亞蘭德對於「小資產階級」的合法看待與對「中產階級」的保留，以獲得他們的支持，這等於是放棄了「社會主義」的革命路線。他們指出亞蘭德在一九七〇年的總統選舉中，他曾利用「社會主義」在選舉中獲得很多進展，但是他在執政之後，却沒有一個有能的權力機構來實行。因此，「左派革命運動」不再相信選票可以達到「人民革命」的目的，而採取已被擊斃古巴共黨頭子「蓋瓦拉」的理論，主張「暴力革命」是不可避免的。雖然「左派革命運動」否定合法與和平的改革，但是他們的策略仍是要與「人民統一陣線」接合，以對付那些阻礙「社會革命」的敵人，如此才能迫使亞蘭德樹立一個更為激進的革命目標。

「左派革命運動」對亞蘭德的壓力是從農民開始。因為智利農業原本就是一個落後的形態；不僅全國土地面積只有28%是可耕地，並且農業結構尚無多大改變，大地主迄今仍然存在。亞蘭德執政以後，雖然農業政策爭論得亦很厲害，但從一九七〇年底至一九七二年初，亞蘭德政府尚未對大地主採取任何行動。所以他們就譴責亞蘭德不瞭解那些遭受壓迫的農民所以要革命的性質。當卡斯楚訪問智利之際，「左派革命運動」的首領恩利哥(Miguel Enríquez)在塔摩哥(Temuco)演說，就曾煽動農民說：「亞蘭德不要走向農民羣衆而進行改革，如此他就不能直接掌握國家的真正權力。以致從一九七二年二月以來，農民與地主的衝突層出不窮，特別是在奧索諾(Osorno)及塔摩哥兩地，就有「左派革命運動」所領導的「農民革命運動」(M.C.R.)與大地主所領導的極右派組織(Guardia Blanca)發生「武裝衝突」。

九七二年四月，在聖地牙哥以南的康塞普森(Concepcion)兩派又在街頭展開戰鬥，直到本年五月，此一衝突已形成一種農民革命的情勢。(註六)總之，「左派革命運動」是唯一一對亞蘭德具有影響的一支左派力量。「左派革命運動」除去領導農民革命之外，在工人、士兵以及學生中亦有分支組織。他們從各方面對以社會黨為核心的「人民統一陣線」進攻，迄今已使「人民統一陣線」很多份子發生動搖了。

伍 亞蘭德的猶豫

究竟什麼是亞蘭德的「社會主義」路線呢？如果從亞蘭德與極左和極右兩派的鬥爭來看，亞蘭德似乎是要在不同的階級利益上來建立不同的羣衆路線，而成為一個代表不同階級利益的政府。誠然的，亞蘭德的「人民統一陣線」與智利一九三八年的「人民統一陣線」，情勢已大不相同。這就是說，雖然亞蘭德的「人民統一陣線」的兩大支柱——「社會主義黨」與「共產主義黨」相互間亦有很大矛盾，但是他們都不忽略那些較為溫和的羣衆所形成的一股力量。這主要是在智利的歷史上，「人民統一陣線」除了與各階層羣衆妥協之外，從來沒有能阻撓傳統勢力的發展。由是亞蘭德的「社會主義」路線，可能是一個長程的計劃上緩慢的進展。譬如亞蘭德認為其所面臨反對黨的困擾還不是一個嚴重的問題，而將來致其政府於悲劇的，既不是軍人，亦不是國會，乃是那些已在憤怒的羣衆。誠然極右派雖然很想推翻亞蘭德政府，但是當他們回憶起在一九七〇年十月，爲了惱恨右派的陸軍司令司西尼德(Remé Schneider)的背叛而支持亞蘭德，所進行對司西尼德的謀殺，其所激起羣衆的反感與對亞蘭德的同情，迄今仍是一大教訓。所以他們雖不滿意亞蘭德，但又無意挑起軍方的叛亂，正如右派的領袖羅德里蓋(Pablo Rodriguez)最近的聲明所說：「如果軍方實行干預，他們還是要支持一個民主的政府」。再如極左派方面，他們的口號雖然在一個充滿失業與「宗教運動」盛行的環境裏，但是還沒有絕對的影響，因爲幾乎所有三萬四千家私人企業活動，還沒有控制在勞工的手裏；國營企業中「工人參加」的口號，還沒有發生作用，同時，智利有一大半的工人是在一個不到五個人的小型工廠工作，他們的結合比較不太容易。

亞蘭德鑑於極左與極右派對選舉中的羣衆還不能發生決定性的影響，當然就必須注意到那些「中產階級」與猶豫不決的羣衆，因為迄今他們還是決定選舉勝敗的一股力量。就如智利的輿論，迄今仍爲「資產階級」所掌握，亞蘭德所有企圖對那些大衆傳播事業的接管，均已失敗。這是說明智利人民在保持其傳統文化方面已經是根深蒂固了。

然而極左派對亞蘭德政府的攻訐，仍會引起一些羣衆的共鳴，何況對於「人民統一陣線」的團結亦有分化的作用。如果亞蘭德爲了避免與國會衝突，暫不採取激烈的手段，那麼是必與其標榜的「社會主義」路線相違背，在他的任期內，各項改革上亦將不會有何作爲。相反的，如果接受極左派的要求，使農工羣衆成爲政治鬥爭的主要力量，亦必然會激起政治上的劇變，起碼他要容納極左派的力量與右派及中間派的政黨死拚。在這方面如取決於人民公決的時候，那就要決定亞蘭德是否加強權力或離開政府，這當然是一項冒險的行動。所以亞蘭德在極困難的選擇中，仍將寄望於一九七三年四月的國會議員選舉能夠獲得勝利，然後再作定奪。

陸 政局的發展

一九七〇年的總統選舉，實際上，亞蘭德只獲得38%的選票。一九七一年四月的地方選舉，亦只獲得50%的選票，均不足多數。未來一九七三年四月的國會議員選舉，一百五十位衆議員、五十位參議員的一半都要改選，這將是對亞蘭德的重要考驗。在這個重要關鍵上，亞蘭德必然要在政治鬥爭中減少衝突，並且在其「社會主義」路線上儘量避免走上極端。一九七二年四月六日，激進黨的分裂派——「民主社會黨」的司法部長桑賀野茲（Manuel Sanhueza）、礦業部長強克（Mauricio Jungk）抗議亞蘭德拒絕接受國會於一九七二年二月所通過的憲法修改案，以限制總統對所有私人企業進行徵收的權力，即退出了「人民統一陣線」的政府。而在「人民統一陣線」中扮演重要角色的親蘇派共黨，更主張與基督教民主黨妥協，容納該黨進入政府。這些都迫使亞蘭德在各項政策上，亦必須要有一個改變不可。事實

上，從一九七二年初，亞蘭德已緩和了左傾的經濟措施，暫時停止國營企業的擴張，並且從巴黎會談中，亦已建立了以合法途徑謀求解決「銅礦國有化」及外債問題的基礎。尤其是亞蘭德接受共黨的建議，爲達成與「中產階級」的妥協，而在一九七二年六月十七日，進行了自其執政以來第三次的政府改組。在這次政府改組中，雖然他仍以「人民統一陣線」的六個左派政黨爲基礎（註七），但他却撤換了六個重要部門的首長。其中之一就是經濟部長佛斯哥維克改由社會黨的馬蒂斯（Carlos Matus）出任。馬蒂斯是四十歲的經濟學家，出身於美國哈佛大學，這顯示亞蘭德有意要改變那些激進的經濟措施。其二是農業部長改由基督教民主黨的泰恩樞（Jacques Chonchol）出任。其三是前礦業部長帕拉徹（Palacios）是軍人，因爲他與工會已形成對立，惟恐引起勞工與軍人的對抗，而改由屬於共黨的阿拉蒂（Jorge Aratt）出任。其四是財政部長改由共黨政治局委員、現任衆議員，而主張與基督教民主黨聯盟的米拉斯（Orlando Millas）出任。其五是勞工部長改由一名婦女，現爲共黨政治局委員，衆議員的波拉塔（Mireya Balsa）出任，主要是調解勞工不斷提出增加工資的糾紛。

亞蘭德政府改組之後，其在各項措施上將更趨向溫和。但不可忽略的這亦是亞蘭德的一種臨時策略，其主要目的是爲了贏取明年四月的國會議員選舉。基此預料，如果亞蘭德在未來國會議員選舉中獲得多數席位，當然他可以在減少國會的阻力下，以合法程序進行他的左傾經濟措施。如果在此一選舉中失敗，亞蘭德亦可能冒險走向極端，而給智利帶來更多的災難。

註一、參閱開研第六卷七期拙作「智利的自由革命與今後動向」。

註二、Le Monde 4—4—1972。

註三、Le Monde 16—1—1972。

註四、"Est & Ouest" No. 487. 16—30—4—1972。

註五、同註三。

註六、一九七二年五月十四日星島日報。

註七、所謂「人民統一陣線」乃是由社會主義黨、共產黨、激進黨、獨立黨、民主社會黨、人民聯盟等六個左派組織所組成。